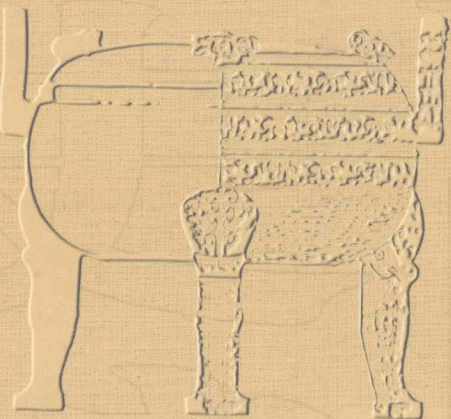


陈其泰 著

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陈其泰◎著

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陈其泰著. —北京: 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13-4481-9

I. ①历… II. ①陈… III. ①历史编纂学—研究
②民族精神—研究 IV. ①K062②③C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0996 号

书名 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

著者 陈其泰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h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2.75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0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4481-9

定价 69.00 元

内容摘要

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站在 21 世纪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是当前推进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应当在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上形成共识：（一）历史编纂是史家才、学、识、德的重要载体；（二）历史编纂是“再现真实历史”的综合创造过程；（三）历史编纂的内容广度和著述格局均随时代而发展，必须以动态眼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再作更广泛深入地探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学科体系就一定能建立起来，并使之不断完善。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是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联系的，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我们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何在，分析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记述议论、组织安排等项。如，《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从编纂思想分析，其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表明早先的天命观已经动摇；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不朽名著《史记》之所以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其重要原因即在于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主要包括：司马迁自觉地构建规模宏伟的史著，“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配合，构成社会的“全史”，容量广阔，极有伸缩性；重视记载人物的活动，多方面地、深刻地表明“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停留在单纯记述史实，而是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通过史著来表达独立的思想体系。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考察，就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

二

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

中国古代设置史馆始于北齐，大规模诏修史书起自唐初。以往论述古代设馆修史，多从批评角度着眼，这是很不客观、公允的。本文着重总结设馆修史的经验，主要论述：（一）主修者在总揽、确定全书的记载内容，提高史书的价值；苦心擘画经营，从搜集史料做起；针对迁延多年的问题作出决定；精心修改史稿，使之成为体例协调的一代典册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二）预修的史臣除分任撰修外，还在商议、制定体例，发挥专家之学，记载典章制度，以及抵制曲笔粉饰、力求写出信史等方面各效其能。（三）其教训和失误，则有权臣监修，乱加干预；成于众手，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造成歧误重复、回护不实、徇情曲笔等项。当前，国家纂修《清史》的工程已经启动，总结历代设馆修史的功过得失，对于完成此项重大工程大有裨益。

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

中国历代官修史书的相继纂修，和不同时期众多有识史家视著史为名山事业、撰成有独立见解的著作，二者双流并进，共同汇成几千年奔流不息的史学长河。东汉朝在东观纂修当朝史，是设馆修史的肇始。其后历三国至南北朝三百年间不断积累经验，史馆制度逐步形成。曹魏、两晋、南朝都设置专职史官纂修当朝史或前朝史；而十六国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因认同中原文化，也多有设置史官记载史事。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自立国以后百余年间一直重视修史，历任史官撰成的国史资料最终成为北齐初年魏收奉诏纂修《魏书》的依据。专职修史的机构在北齐初年开始出现，这一事实意义深长，证明史馆制度既是由华夏民族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发展而来，同时又是因鲜卑族政权实行汉化直接导致而设，因此无疑是民族文化认同结成的珍贵果实！唐朝建立，因实现了南北民族的统一，文化上显示出雄伟的创造力，史馆制度至此正式确立，朝廷诏令魏徵、令狐德棻等人主持修纂梁、陈、北齐、北周、隋朝各史。唐初确立的史馆修史制度和完成八部“正史”的巨大成绩，大大加强了我国历史记载长期连续的传统。以后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两朝，都十分重视纂修前朝史，作为朝政大事。这是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意义重大的成果，成为中华各民族走向统一的纽带和强大的凝聚力。

设馆修史与历史资料的丰厚储存

唐初设馆修史成为定制之后，修前代史和修国史作为朝政大事受到政府以致

整个社会的普遍承认，确立了一套制度，在纂修前朝史上保证了记载的连续不断，而且在纂修本朝史方面准备了丰富史料。正是史馆制度的确立，为唐以后各王朝史料的积累奠定了基础，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留下了大量的材料。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历史编纂学的新视域：以《汉书·刑法志》为个案的分析

《刑法志》是《汉书》十志中的名篇，以往的研究尚未对其思想价值和编纂特色作充分的揭示。本文以此作个案分析，从“如何做到真实、深刻地再现历史”；“匠心的运用和巨大的震撼力”；“比较马班不同风格，为《汉书》作准确的历史定位”三个方面，论证其重要的价值。并说明：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将为史学史学科开拓新的学术视域，此对于推进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三百年历史编纂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

中国史学行进到17世纪以后，存在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方面，历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史书由于缺乏以高明的史识作为指导，参与纂修者拘守成例，不知变通，因而造成如章学诚所批评的“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严重流弊；另一方面，后出的纪事本末体裁则显示出其“因事命篇、起讫自如”，“决断去取、体圆用神”的突出优点。有识史家面对这种局面而深受启发，努力寻求革新之路，因而在历史编纂上出现了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骥撰《绎史》，创造了熔合众体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

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

四

之法”的主张，作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20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太炎、梁启超又为编纂《中国通史》设想了新的体裁。马、章、章、梁是近三百年史家中之佼佼者，他们的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其总目标是：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救治其严重弊病，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综合体。他们的努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世史学发展的要求，深刻地体现学术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要求。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当代史家由此获得宝贵的启迪，激发历史编纂的创造精神，并一再结出丰硕的成果。

晚清典志体史学名著的时代特色

中国史学发展到晚清时期，由于新的时代需要推动历史编纂的发展，一批见识卓越的史家均重视对典志体的改造。这一现象实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典志体史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内容包涵宏富，适于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各方面情状；二是篇目的设立极具灵活性，可根据需要增减、扩充，储备新知识，发表新见解。晚清民族危机深重，改造了的典志体正能符合呼唤御侮图强和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的迫切需要，因而大放异彩。魏源、徐继畲、黄遵宪等爱国史家先后撰成的名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日本国志》，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宝贵的创新价值，并对探求救国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出色史家的爱国精神、学术成就，及其为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发动奠定基础的贡献，值得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求对晚清史学的历史地位重新作出客观的评价。

20世纪中国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

发展新史学，在不断提升其科学的内容和精良的方法的同时，还应赋予它以富有中国民族特点的表现形式，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当今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这项工作实有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重要现实意义。这就需要从总结20世纪的有益经验中得到启发。以往对于20世纪中国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的成就未作系统研究，是一个不小的缺陷。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讨论：（一）20世纪之初夏曾佑、章太炎、梁启超的尝试；（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张荫麟的探索；（三）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翦伯赞的贡献。

白寿彝先生与中国历史编纂学

中国传统史书记载丰富，体裁形式多样，但以往一向只被视为史料，几乎无

人认识到其中蕴涵的思想价值，白寿彝先生则长期倡导对历史编纂学开展研究，并为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46年他所撰《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为首次系统地论述历史体裁的发展，并提出要借鉴前人的成果创立“以立体式写史”的新观点。以后在《谈史学遗产》（1961年）和《谈史书的编撰》（1981年）等论著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发掘和总结历史编纂学遗产的任务，并从历史编纂学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学科建设提出了宏观构想。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创立了“新综合体”的新的著史体系，即为其长期的理论探索在史学实践上的成功运用，对于当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

在共商如何实施纂修大型《清史》这一旷世巨典的时候，通过深入讨论，集思广益，共同确立一种比较妥善的体裁，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合理、完善的载体，使之能够容纳并恰当地组织丰富、科学的内容。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出对历代沿用的纪传体之继承性。另一方面，必须发扬近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他们的真理性认识和创新精神，在他们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突出21世纪的时代要求，自觉地以科学历史观为指导，开辟历史编纂的新途径。要体现历史的智慧，通过记载和总结清朝的盛衰，对我们今天治国、兴业、行事、做人产生有益的启迪，鼓舞人们在新世纪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总之，根据社会发展对于历史编纂提出的要求，今天纂修大型《清史》不宜简单地沿用旧的纪传体，而应依据史学发展的需要对它实行根本性的改造，吸取20世纪有识史家的有益经验，创造一种新的综合体裁。初步设想其主要部件为：以“综述”为主干和灵魂，来再现清代社会演进的总相和脉络，论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方面的大事；总结不同阶段的特点，阐明清代历史演进和盛衰变化的内在原因和规律性：此为以往纪传体所无，是新体和旧体最大的不同。以“志”来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各方面情状、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各篇“志目”均围绕“综述”这一主体部分来写，且作动态的考察，通过每一侧面，进一步反映清时期的历史特点。以“传”记载清代的帝王、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重要的官员、思想家、学者，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不但要写出传主的活动，并且要通过记述人物，更生动地表现时代的特点。再加上“表”和“图谱”，多种体裁互相配合，形成有机的整体，用这样的“新综合体”来纂修大型《清史》。

关于“民族精神”内涵的理论思考

黑格尔阐释“民族精神”是一国文化所具有的普遍原则等项，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但他却夸大“民族精神”为万能的，故对其得与失应有客观的评价。20世纪处于民族危难时刻的中国学者，如梁启超、郭沫若、萧一山等论述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心”、“自强不息”等，至今仍有宝贵的理论价值。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我们今天对“民族精神”的内涵应作出更恰当的界定：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对民族发展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

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

本文围绕“中华民族精神研究”这一课题探讨三项理论问题。其一，“民族”的概念，包括单一民族和全中国56个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两个层次，中华民族是在多个民族基础上形成的统一、坚强的民族共同体。其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几千年中形成的民族文化认同具有无比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我们中华民族成为占世界上人口最多、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的坚强统一体。在古代，中原华夏族与周边民族就形成了互相交流、融合的趋势；从秦汉开始，统一的格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其三，儒家经典中进步夷夏观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春秋公羊学派对夷夏关系问题持“夷”与“夏”可以互变、二者同样可以进化的观点，反映了古代各民族间交流和统一不断发展的趋势，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这种开放、进步的夷夏观成为古代儒家学者民族观的精华，具有宝贵的价值。

论民族精神的成因

民族精神作为伟大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结晶，其成因必然与民族的生存条件和活动环境密切相关；民族精神作为民族特质的集中体现，其成因有受环境影响而长期潜生暗长，如酵母发散蔓延的一面，更有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以其著作或言论加以概括提炼，或是因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实践楷模、垂范作用而得到扩充和提升；民族精神在几千年历史途中必然是发展的，绝非自古至今一成不变，它因民族处于兴旺阶段增加了新的宝贵成分，当民族处于坎坷磨难阶段它又经受考验而得到锤炼。概括言之，民族精神的成因是一个受到民族活动各种条件影响的、起伏前进、不断发展提升的过程，可以大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活动

环境的影响，文化基因的发展；二是历代哲人的提炼，杰出人物的垂范；三是时代风雨的锤炼，当国家兴盛时期，民族精神得到勃发，当国势衰落时期，民族精神得到淬砺、考验。

论民族精神的功能

今天，总结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漫长征途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当前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概括来说，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国家的兴旺强盛具有三项极为重要的功能：（一）精神支柱的功能；（二）凝聚力量的功能；（三）教育激励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必定能够在未来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谱写出新的壮丽诗篇。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代的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既有其核心的内容，又有在不同历史阶段多样的表现，研究者应当从历史进程中深入探讨民族精神的提升和发展。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汉朝是一个富有活力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研究这个问题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其中较为突出的三项是：（一）汉代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创造力，显著地表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各方面有作为的人物大量涌现。（二）汉代政论家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引义慷慨”，勇于建言，毫无忌讳地对重大问题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三）汉代人物如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建构的学说体系，撰写的宏文典册，为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史记》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司马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囊括在不朽的巨著《史记》之中。其“大一统”的政治观，周边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民族观，和广采兼容的文化观紧密交织，相得益彰。《史记》是在古代国家实现空前统一和全国范围内各民族的融合达到空前规模的汉代著成的，其政治观、民族观和文化观正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史记》如此杰出的成就，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一步奠定了深厚牢固的基础，在两千年漫长岁月中发挥其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巨大作用，其深远影响一直达于今日。

对清代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及时总结

嘉道年间著名学者龚自珍、魏源、何秋涛，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长期

致力于研究边疆民族问题，对清代实现多民族统一局面进行及时的总结。他们的出色贡献是：强调清代在康雍乾以后，“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应当大力加强中央与边疆的关系；论述国家统一带来边疆地区老死不知兵革，民户休息更始的新局面，谴责违反民族和好的错误论调和破坏行为；高度评价土尔扈特部历经一百多年曲折，最后回归祖国是“自生民以来未有之盛举”，赞颂中华民族统一的巨大向心力。

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历史文化认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披荆斩棘、战胜无数劫难、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精神纽带。到了近代，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历史文化认同面临了一系列紧迫课题，这就是：抛弃“天朝上国”的幻梦，直面御侮图强和认识世界文明真实格局的双重任务；阐发历史变革思想和“改从西法”的主张；实行维新变法，走世界各国的宪政道路和发展资本主义；掀起民主启蒙思想潮流，为废除封建专制、创建“全民族的共和国”而奋斗。近代历史文化认同的逐步发展，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推进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正相合拍。

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新格局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年，近代历史文化认同又有了时代内涵极其深刻的提升。此即早期维新派大力倡导的历史变革观和维新志士掀起的近代思想启蒙潮流。王韬、郑观应等人对于世界潮流有深切的观察，同时反映了国内出现一批近代工业的发展需要，他们纷纷介绍“西政”、“西法”，要求中国实行变革。康有为发挥、改造传统的公羊三世进化观，并与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思想相结合，锻造了维新变法的理论纲领，对抗陈腐僵化的封建思想体系，要求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动员民众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力量。谭嗣同、黄遵宪、严复批判封建专制、倡导进化学说；梁启超更大力输入西方民权思想和其他进步社会学说，在广泛的领域内从事近代思想启蒙，宣传了一整套在当时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由此点燃起进步青年救国和革命的热情：都对近代历史文化认同和社会进程产生了意义重大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辛亥革命的准备和爆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进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件。与孙中山等先烈组织革命党、策

划武装起义相配合，革命派思想家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相继发表犀利的政论，揭露清廷反动本质，宣传民主共和国的理想。革命的舆论宣传产生了伟大力量，等于在政治上宣布清朝专制统治的死刑，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革命必然爆发的结论，对全国人民形成共同意识、推动革命高涨起到巨大的作用。革命党人从1906年到1911年黄花岗之役接连6次发动起义，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与此同时，大量进步刊物在各省相继出版，广泛传播，动员愈加深，爱国民众革命觉悟迅速提高，形成“革命之声遍倡于国中”，“革命之思潮澎湃而不可遏”的雄伟声势，因而迎来武昌首义的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二千年封建帝制，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民主共和的新时代。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是革命派浴血战斗取得的，同时也是全国民众，包括居住海外的爱国华侨和边疆各民族人心所向，为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在救亡图强、革故鼎新的民族精神鼓舞下，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力量而取得的胜利。广大华侨和全国各民族在全力支持和积极响应辛亥革命的共同行动中显示出来的巨大向心力，更是对中华民族觉醒的有力推进。

理性主义对待“排满”与近代民族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民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精神纽带。至20世纪初年，反满革命是中国社会前进的客观要求，也是推进民族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革命派对于“排满”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以章炳麟为代表，是单纯的“排满革命派”，认为革命即反满，从满人手里夺回政权重归汉人，革命即完成；“光复”之后，满族二十年不得有选举权。这种主张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革命鼓动作用，但在理论上却表现出浓厚的大汉族主义。以陈天华、孙中山为代表，则以理性主义对待“排满”，明确地对“排满”与革命作了正确的区分，指出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国家以后，将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平等联合。这种主张对革命后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有更明确的目标，自觉地担负推进文化认同和国家统一的责任；孙中山更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民族统一”思想。梁启超则是在学术思想上冲破封建思想体系、勇于创新、推进近代历史文化认同的出色代表，他所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初步构建了近代民族观的理论体系，并在《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著作中作了成功的运用。

陈垣与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

八年抗战，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进步史家群体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他们怀着崇高的民族责任感，自觉地把学术工作与神圣的抗战事业紧密相联系，因此形成抗战史坛爱国主义精神高涨的局面。陈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使他的学术思想实现了升华，由原先崇尚严密考证而达到明确地“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撰于1938至1940年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即为一部激扬民族正气的名作，书中以大量新发掘的史实和精辟的议论表彰明末遗民以“逃禅”而坚守民族气节的高尚精神，藉此以斥日寇、斥汉奸。此书在当时给予坚持英勇斗争的抗日军民以有力的鼓舞，远在西南的陈寅恪为此书作序，表明二人志节相同、肝胆相照。陈垣本人自此一发不可收，继之又连续著成《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书，构成陈垣抗战史学系列，谱写了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出色篇章。

目 录

内容摘要	1
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1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13
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	33
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	53
设馆修史与历史资料的丰厚储存	62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69
历史编纂学的新视域：以《汉书·刑法志》为个案的分析	94
近三百年历史编纂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	104
晚清典志体史学名著的时代特色	117
20 世纪中国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	132
白寿彝先生与中国历史编纂学	143
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	157
关于“民族精神”内涵的理论思考	173
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	180
一、“民族”概念的两个层次	180
二、民族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	182
三、儒家经典中进步夷夏观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推动作用	185
论民族精神的成因	190
论民族精神的功能	202
中华民族精神在汉代的发展	215

《史记》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227
对清代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及时总结	238
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历史文化认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247
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新格局	257
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	270
理性主义对待“排满”与近代民族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280
陈垣与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	295
[附 录]	308
谈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308
孙中山的公仆形象在历史上应大书特书	326
永记卢沟桥的炮声	329
河西考察记	333
后 记	347

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历史编纂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英语中，与“史学史”和“历史编纂学”相对应的词语，都是 historiography，西方有一份英文杂志 *Historiography*，其内容即为研究史学发展史。故广义的“历史编纂学”，即相当于史学史。狭义的“历史编纂学”，则是指在史学史学科之内所包括的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历史叙事学（或称“历史文学”）等相并列的几个分支学科之一。本文所讨论的即为狭义的历史编纂学。早在 1961 年和 1981 年，白寿彝先生撰写《谈史学遗产》和《谈史书的编撰——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两文时，已经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历史编纂学史”这一分支学科的任务。至今已经过去四十几年和二十几年。构建这一学科体系既是当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一项内容包括甚广、任务艰巨的学术工程，亟须史学界同仁共同努力。这里谨就其中几个理论问题提出初步的思考，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新的学术增长点：确立“历史编纂是史家才、学、识、德之重要载体”的研究视角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举世无匹，无论是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还是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都放射出灿烂的异彩，令世人叹服。从史书体裁言，《四库全书总目》区分为 15 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梁启超《新史学》则将史书体裁区分为 10 种：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地志、传记、学史、史论、附庸。其中正史再分为官书、别史两类，如此共细分为 23 类。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创造力，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成为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世代流传。这些名著是历史家呕心沥血著成的，其成功，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严密的编纂方法，这些具有宝贵价值的东西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以往一般认为，史书的体

裁、体例，似乎只关于技术性问题。其实决非如此。史书的组织形式与其内容、思想是辩证的统一，组织形式的运用，结构、体例的处理，体现出作者的史识、史才、史学，包涵着丰富的思想价值和深刻的哲理。白寿彝先生对史书的编纂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幾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①这是白先生根据几十年对中国史学演进的总结，和对当代史学发展的分析，以及本人长期治史的深刻体会而得出的认识，对于我们有极宝贵的启发。我们应当对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内容和价值重新给予恰当的定位：历史编纂学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史识、史学、史才、史德达到何种水平的有效尺度。史家再现历史的能力如何？其史著传播历史知识的效果如何？在这里都直接受到检验。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编纂学，就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成为重要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先以《史记》为例证。尽管以往对这部名著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但若以“历史编纂是史识、史学、史才、史德的载体”这新视角作深入探讨，我们便可对司马迁的杰出成就得出系列新的认识：司马迁创立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裁，与战国、秦汉以来人的作用的凸显二者有密切的关系。这一体裁的创立是中国文化人文主义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也是历史观的进步取得的出色成果。司马迁所设“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各具其用，各自承担本身的任务，而又互相配合，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纪传体的创立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设“本纪”以统理众事，又显示帝王独尊的地位，如刘知幾所说：“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极，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②。总之，列天子为“本纪”以显示至尊地位，以下设立“世家”以记诸侯行事，设立“列传”以记普通人物事迹，形成宝塔形结构。司马迁本人也明言这种体裁安排是为了显示以帝王为中心、众臣拱卫、等级分明的局面：“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② 唐·刘知幾：《史通》卷二《世家》，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